

学术性·资料性·实验性丛刊

语文现代化

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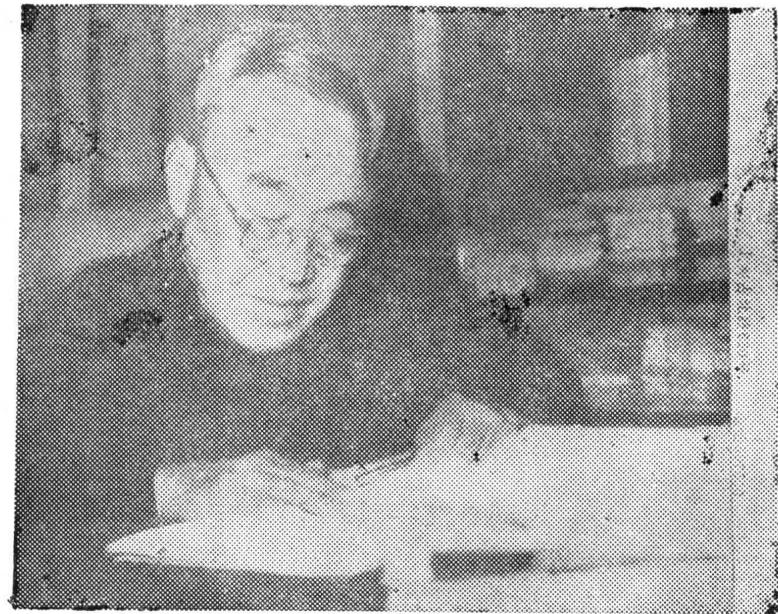
9

- 庆祝吴文祺、张世禄先生学术活动65周年专辑
- 中国的语言研究
- 论社会语言学的方法
- 试论语言的数学模型
- 语义的模糊和明确
- 论陈望道的功能学说
- 新词构成方式上的一个趋向
- 我国近代的两次书面语改革运动
- 文字改革 30 年记事

YUWEN XIANDAIHUA



吳文祺先生



張世祿先生

七十有緒今不稀 人生百歲不為奇
未始終月旁空長髮 遠春花吐蕊枝
醉首何嫌添鵝鬚 重顏多許見雞皮
道翁酒家歌日復 天喜地時

丙子年夏月作於北平
王力

服前此復書 吳郎 壓月乘難兩
彭霜尚憶兩湖天 否人間無奈
是信尋

文祺月志丙子

茅盾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于北京

茅盾题词

王力题词

学术性·资料性·实验性

ZHUANJI 专辑

庆祝吴文祺、张世禄先生学术活动 65 周年

3 题词 (周谷城、顾廷龙、吕叔湘、茅盾、
王力、叶籁士、吕叔湘、倪海曙)

5 活跃语文学术 提倡尊师重教——吴文
祺、张世禄教授从事学术活动 65 周年
庆祝会先后在上海举行

7 吴文祺先生传略 高天如 钟敬华 吴嘉勋

17 祝贺吴文祺师学术活动 65 周年 倪海曙

19 吴文祺先生在中国语言文学研究上的重
要贡献 蒋孔阳 潘之珍

25 吴文祺先生与文字学研究 胡奇光

33 吴文祺先生与《辞通》及《辞通续编》

38 育英硕德的良师——吴文祺教授 周国武

42 用事实检验理论——吴文祺先生对斯大
林语言学说的科学态度 曾达武

46 吴文祺先生著作编目

49 为中国语文现代化勤奋探索——张世
禄教授生平事略 申小龙

60 张世禄先生在普及语言学知识方面的贡献 胡竹安

-
- 65 面向汉语实际的语言研究 许咸汉
71 张世禄先生的音韵学说 赵克刚
76 张世禄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 鲍明炜
80 张世禄先生治学的特点 严修
87 张世禄先生对汉字改革的贡献 许宝华 汤珍珠
92 张世禄先生著译目录
-

LUNWEN 论文 · BAOGAO 报告

- 99 中国的语言研究 邢公畹
129 论社会语言学的方法 毛茂臣
140 试论语言的数学模型 郑通涛
154 语义的模糊和明确 刘泽先
177 论陈望道的功能学说 申小龙 陈丹红
199 新词构成方式上的一个趋向 沈孟璗
210 利奇和比尔论电脑在英语研究中的作用 王宗炎
219 也谈短横 刘涌泉
226 我国近代的两次书面语改革运动
——白话文运动和大众语运动 胡奇光
240 土耳其的文字改革 [日]柴田武著 刘富华译
-

ZILIAO 资料 · WENXIAN 文献

- 255 中国文字现代化的迫切性 美洲中国文字改革促进会
263 关于地图上我国地名罗马化的管见 曾世英
269 文字改革 30 年记事(五)(初稿) 张朋 费锦昌
-

文祺先生六十周年纪念

内蒙第一师范毕业

明德堂同祀八

耆年硕学

年六十五
文祺先生學術活動六十周年

年紀念并六十五慶 顧廷龍敬祝



呂叔湘敬賀

周谷城題詞

顧廷龍題詞

呂叔湘題詞

春申江畔久棲迟，勞逸張弛兩共知。
頻臨堂側字文公高談偶吟詩。
本來先生所謂古詩，
詰勤精业，是猶效声益力之。双声林語中謂之
未便不弱成放蕩，謹書相理
密為緣。

古舊書

文祺先生六十周年紀念

一九八五年冬 周谷城書于上海

祝贺
张世禄先生教学65周年

叶籁士

学贯中西

世禄学长执教六十年纪念

吕叔湘敬贺

叶籁士题词

吕叔湘题词

倪海曙题词

万花如海
松柏长春

祝贺张世禄师学术活动
六十五周年

学生倪海曙
1986.9.

活跃语文学术 提倡尊师重教

吴文祺、张世禄教授从事学术活动 65 周年庆祝会先后在上海举行

上海市文化学术界和民主党派人士 200 多人，于 1986 年 10 月 27 日在联谊俱乐部聚会，庆贺著名语言学家、文学批评家、教育家、复旦大学教授吴文祺先生从事学术活动 65 周年。

庆祝会由上海市社联主席罗竹风主持。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林克致贺词，他说：吴文祺教授早年就追随我们党，参加我们党，他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那天起就一直坚持着，即使在失去与党组织联系的险恶环境里，也从未动摇过。长期以来，不论风里雨里，他始终与我们党心连心、肩并肩地向前进。他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渗透到学术领域中去，不断地开拓新的境地，以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敢向蛮荒开世界，银锄铁臂育新苗”，这两句话正是他自己学术生涯的生动写照。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夏征农，著名教育家刘佛年，专程来沪祝贺的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会长倪海曙等人士在会上致词庆贺。他们在发言中赞颂吴文祺先生坚定的政治品格，多方面的学术业绩。从“五四”时期为白话文、新诗的呐喊，到 30 年代自觉地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成研究新文学的开山之作《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等论著；从 50 年代最先开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语言学引论”等新课程，到参与商定文字改革、汉语规范化等国家的语文政策；从 60 年代致力《辞海》等大型辞书的建设，到 80 年代完成巨著《辞通续编》，凡此种种，都体现着他的真知灼见，深为国内外学者所叹服。他先后在武汉中央军政学校、燕京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任教，足迹半个中国，培养的学生遍及军事、政治、文学、语言等各条战线，其中不少同志还成为国家的栋梁、学科的带头人。

86 岁高龄的吴文祺先生在会上致答词，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并说，他一生能走上正道，是因为较早地接受了党的领导和教育培养的结果。今后还要在党的领导下更加努力地作出贡献。

有关方面领导人和文化学术界人士毛经权、杨士法、赵超构、徐以枋、董寅初、张瑞芳、顾廷龙、王西彦、李俊民等参加了这次庆祝会。

* * * * *

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复旦大学教授张世禄先生从事学术活动 65 周年庆祝会，于 1986 年 10 月 28 日在上海联谊俱乐部会堂隆重举行，文教学术界人士 200 多人出席庆贺。庆祝会由文字改革活动家倪海曙主持。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林克首先致贺词，他代表复旦大学党政领导和全体师生向张世禄教授表示衷心的祝贺，他说：张世禄先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有名望的学者，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忠诚教育事业，为祖国的语言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他“学贯中西”，不仅译介西方语言学的成果到中国来，而且把它们引进和结合到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之中去；他是把教学工作同科学相结合的表率，他的教学艺术一直为学生们所钦佩，他的教学内容时时用自己学术研究的成果加以丰富、充实和更新，同时又在教学中不断发现问题去作研究，他的不少著作就正是从教学中诞生的；他还一个特点，就是十分重视学术的普及工作，他为小学教师写书，为青年学生写作入门书，把深奥的语言学原理表达得深入浅出而引人入胜，这种将提高和普及相结合的学术作风，正是表现了他热爱群众、为人民奉献自己力量的高尚精神。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夏征农，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罗竹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锐，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许威汉，学林出版社副总编辑雷群明，先生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申小龙等人也都在会上致词祝贺。他们赞扬张世禄先生为人治学的高贵品质，赞扬他 65 年来一直献身语文事业，在语言科学研究、语文教育、语文现代化和规范化、对西方语言学说的译介和引进、对我国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创新和在汉语研究的各学术部门的开拓或革新等方面，都贡献了卓越的学术业绩。张世禄先生在会上激动不已，用连声的“谢谢”来答谢大家的盛情。

* * * * *

这两次庆贺活动是由周谷城、吕叔湘、倪海曙、罗竹风等 39 人发起的，得到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上海市语文学会、复旦大学中文系、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上海辞书出版社、学林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等 11 个单位的赞助。
(G. L.)

ZHUANJI 专辑

庆祝吴文祺先生学术 活动65周年专辑

吴文祺先生传略

高天如 钟敬华 吴嘉勋

吴文祺先生原姓朱，字问奇，曾用笔名有：文、立生、寒风、朱凤起、吴敬铭、陈宗英、王微明、司马东等。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学评论家、教育家。1901年2月24日（夏历正月初六）生于浙江海宁县袁化镇的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朱起凤为名著《辞通》的作者，当时为海宁米业学堂小学教员。先生出生一岁余，生母吴彩霞不幸去世，遂由外曾祖吴浚宣领养为嗣曾孙，改姓吴。养母蔡锦云知书识礼，督责甚严。过继曾祖吴浚宣为清同治辛未（1871）进士，任翰林院检讨。后因支持太平天国革命而借故辞官还乡。丧失长子及长孙的曾祖，对曾孙特别钟爱，亲为开蒙，并讲古人嘉言懿行。先生九岁离开新仓镇的吴家，由养母陪同，回到硖石镇在生父朱起凤任教的米业学堂求学。当时，先生的父亲已参加同盟会，家中藏有《民报》、《浙江潮》等进步刊物，先生常背着父亲悄悄翻阅。小学毕业后，入师范讲习所，为朱宗莱私淑弟子，获益良多。十六岁始，在硖石一边担任小学教员，一边在父亲指导下参与《辞通》（原名《读书通》）的编纂，学问颇多长进，从此打下国学的坚实基础，同时在音韵训诂方面发表不少有价值的见解。朱起凤的《辞通·释例》云：“此书音训，有沿用旧注者，有采清儒之说者。要皆参以己

意折衷一是。儿子文祺颇究心音韵训诂之学，有所陈述，间亦采录，兹为节省篇幅计，不复一一识别。”

1919年“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先生在新学的影响下，学做白话文和新诗。1921年南京《东大月刊》出了一个《诗学研究号》，提倡旧诗。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斯提撰《骸骨之迷恋》一文，痛加指斥。为参加这一场辩论，先生撰《对于旧体诗的我见》、《驳旁观者言》、《驳又一旁观者言》等文，提倡新诗。此后，针对某些新诗人所作诘屈聱牙的旧诗体诗及为其辩解的文章，先生又写了《新诗人偶作旧诗问题》等文，重申自己的主张：对于古代文学的整理、研究和鉴赏，完全必要，但若引导青年人抛弃白话文，一味学做古诗古文，则是背离了“五四”的方向，不能不斥之曰：“开倒车”！1923年先生在《联绵字在文学上的价值》一文中，还提出一个关于丰富和发展白话文学语言的主张，即新文学的语言既要吸收那些富有表现力的“外来语及方言及新造词”，也要注意采用联绵词。这些颇具新意的见解，深为时人赏识。当时还未相识的郑振铎曾在《文学旬刊》上刊登启事，希望同先生通信交往。不久，先生即经他的介绍加入“文学研究会”，以后又被邀为《文学季刊》的特约撰稿人。先生初登学坛，即以锐意进取的才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名尖兵。在1921年到1924年间，先生在《文学旬刊》、《时事新报·学灯》、《小说月报》、《鉴赏》、《新浙江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十余万字倡导新文学的白话文章。

1924年，经宣中华、华林介绍，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直接从事党领导下的革命实践活动。在杭州先后担任共产党浙江地区共青团经济口和宣传口的负责人。1926年1月考入商务印书馆，在国文函授部任编辑兼教员，同时秘密做党的工作，任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党小组长和党中央交通员，负责向设在上海的党中央转交各地党组织的刊物，并通过沈雁冰，介绍来沪的各地共产党员和有关负责同志联系工作。由于先生的邮件多，寻找他的人也多，

很快引起别人的注意。不久，即被商务印书馆解聘。这时正值恽代英托沈雁冰代为介绍武汉中央军政学校的政治教官，先生即由沈雁冰介绍于 1926 年前往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任中央军政学校政治教官。先生潜心研究马列主义，讲授“社会发展史”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两门课程。所需教材均由先生编成详细提纲或讲稿。蔡和森著《社会进化史》被列为主要参考书。当时军政学校的学生多达三千余人，分为步兵大队、炮兵大队、工兵大队和学兵团等。先生轮流在各处讲课，讲毕一门，再讲另一门，工作异常繁重。除教学外，先生尚兼任政治教官党组书记，在恽代英等党的负责人直接领导下开展党的工作。先生写的讲稿，也由任政治总教官的恽代英审阅。这对先生的思想发展有深刻影响。此时，先生还应沈雁冰之约，同郭绍虞、傅东华、宋云彬等一起组成“上游社”，编《上游》周刊，作为武汉《中央日报》的一种文艺副刊，对当时麻痹斗争意志的专讲草木虫鱼的文学和“新月派”加以抨击。后来沈雁冰于 1929 年书赠先生条幅，所云：“眼前非复旧吴郎，岁月艰难两鬓霜。尚忆两湖风月否？人间无奈是沧桑。”（“两湖”，即两湖书院，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所在地）就是对于那一时期革命情谊的追忆。

大革命失败后，遵照恽代英的安排，先生回到上海，听候组织召唤。由于当时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原待联系的线索中断，从此未能接上党的组织关系。

1928 年，经周予同介绍任商务印书馆馆外编辑。1929 年春应聘任教于厦门集美高级中学及高级师范。1931 年秋任教于上海浦东中学。1932 年秋任教于浙江温州第十中学。1932 年夏，先生赴北平，先后由郑振铎、李达、钱玄同诸先生介绍任燕京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讲师。先生一面教书，一面坚持宣传马列主义，开展革命活动。曾参加北京师生要求民主和自由的爱国运动。当先生得悉继任温州第十中学教职的原共产党员许志行及一批进

步学生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立即到处奔走，发表抗议通电。在进步人士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终于迫使温州当局释放了许志行和进步学生。

在此期间，先生继续进行中国文学和语言文字的系统研究。编注出版了《侯方域文》、《曾巩文》、《资治通鉴选注》（与宋云彬合作），著有《论文字的繁简》、《考证与文艺》等学术论文。在大学开设的课程有“中国新文学史”、“范文选读”等。先生的讲课，深受学生欢迎。课堂总是坐得满满的，甚至窗户边、走廊里都站满了人。听讲者除大学生外，竟还有年逾半百的老人。

1935年8月，应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郑振铎的聘请，先生回到上海，任该校中文系教授。讲授“本国国文”、“语言文字学概论”、“中国新文学史”等课。先生在执教之余，继续致力于新文学的研究和学术活动。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赞助出版鲁迅为瞿秋白整理的《海上述林》，为复社主持的鲁迅全集出版委员会标校《嵇康集》、《会稽郡故书杂集》。1936年出版了集先生多年研究成果的《新文学概要》一书。这是一部论述“五四”前后、至30年代新文学的专著，也是一部研究新文学的开山之作。《概要》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新文学运动及其作品的产生和发展，对新文学在诞生时与旧文学的殊死搏斗、新文学内部的各种组织和流派、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作家、特别是对新诗的创作提出了公允的评价和深刻的见解，为新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运用科学的历史主义原则的先例。《概要》指出：“我们要研究‘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一方面要知道‘五四’以前的文学的演变，一方面还要从政治经济的变迁中，去探究近代文学所以变迁之故。”1940年，先生又发表长达十万字的论文《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连载于《学林》杂志第一至第三期。这篇论文是很具开拓性的。如关于章炳麟的评论就颇有见。文中以大量的事实证明章氏是处于我国新旧文学交替时期的一个关键人物。这不仅找到了我国新文学的源流，而且填补

了我国文学史研究上的一段空白。因而郑振铎、周予同等在一份推荐报告中称赞它是“体大思精之作”。在 30 年代，研究古代文学史的学者往往把时限放在鸦片战争以前，而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学者则只注意“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这样从清末到“五四”这一段的文学，在文学史研究方面实际上是空白点。为填补这个空白点，早在 20 年代先生就着手准备，并发表了《一百二十年前的一个文学革命家——章实斋》、《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安先生》。后来，又发表了《再谈王静安先生的文学见解》、《儒林外史对于后来有怎样的影响》等文。因此，先生又是最早研究晚清以来的近代文学史的著述者之一。

1941 年上海沦陷，先生拒不出任日伪政府所办大学的教授，改名换姓，节衣缩食，以卖书维持生活。马叙伦为此写赠条幅：“细雨濛濛欲染中，独行不是为寻春，陌头门闭花千树，撩出杨丝绾甚人。”坚贞的民族气节引起了当局对先生的注意和仇视。事实上先生的姓名已经写上了敌伪企图加害的黑名单。他们曾向已被捕的夏丐尊盘问先生的去处，夏丐尊以“吴文祺早已离开上海赴内地”的回答掩饰过去后，立即设法通报注意安全，才使先生幸免于难。

抗战胜利后，经宦乡介绍先后任《前线日报》副刊及《时事新报·学灯》主编。暨南大学复校后，继任中文系教授。这期间，先生参加了“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做了许多工作。先生还以犀利的文笔写了不少针砭时弊，颇犯时忌的文章。如所撰《学生无伪》一文就是针对当局欲追查青年学生在日伪学校读书一事而写的。声言学生是无罪的，而是当局丧失国土，愧对学生。此后所撰《语言的化装及其他》、《从“胜利月饼”谈起》、《应严惩为虎作伥的保甲人员》、《从青年必读书说到谈古书的用处》以及《悼夏丐尊先生》、《我们要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纪念五四运动》等文，都表达了先生追求进步、振兴中华的奋斗精神。

全国解放后，先生被提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51年院系调整，调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教研室主任至今。历任上海市第一届至第六届政协委员。1952年经周谷城先生介绍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不久即任农工上海市委员会副主任、农工中央常委。先生在解放以后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各项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努力以自己的学识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1956年被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先生的学业，这时转到中国语言文字学的教学和科学的研究为主。为中文系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语言学引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以及“汉语史专题研究”、“中国语言学史专题研究”等一系列语言学课程，并任语言学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的导师，同时兼任许多有关学术职务。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1952年被选为上海语文学会副会长，并任《语文知识》杂志主编。1956年协助陈望道先生组建了复旦大学“文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吴文祺先生任副主任，后改名为“语言研究室”，任主任。1959年成立《辞海》编委会，先生任副主编。同时，兼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上海市文联委员等职。1961年复旦中文系建立“一般语言学教研室”，先生兼任该室主任。

先生潜心于汉语的研究和教学，很注重语言学理论的建设和发扬严谨求实的学风。50年代初先生就和张世禄先生一起审阅校订了高名凯的《普通语言学》上、下两册。1952年开始，在复旦大学开设“语言学引论”课，当时在国内高等学校中尚属首创的新课之一。这是在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著名论文以后，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起来的一门理论语言学课程。该课以丰富的汉语资料阐述了一系列关于语言哲学和语言结构规律的一般问题。如语言的分化和统一、语言的稳定性和变动性、语言和文字、语音和语义等诸种语言矛盾现象，在课堂上均作了精辟而充足的讲解。同时，先生告诫学生，学习马列主义主

要在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在于背诵某些词句，对经典著作中的定义还要用汉语的事实去检验。先生指出斯大林所谓“文法的特点就在给以词的变化的规则”，就未能概括汉语的实际。先生还很注重把语言的理论研究同解决汉语文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1955^年他出席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会上先生坚持民族共同语总是建立在某一方言的基础上，标准音必须以活在人们口头上的单一音系为据的原则，为确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标准提供了很好的意见。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后，先生立即发表了《坚决拥护〈汉语拼音方案〉》一文，指出方案对推广普通话和普及教育的伟大作用。在纪念《马氏文通》出版 60 周年时，先生写了《关于〈马氏文通〉》一文，既肯定“它初步钩出了古代汉语语法构造的轮廓”的历史价值，又指出它“反对语文改革运动”、“生搬西洋语法”、“缺乏历史发展观点”等不足之处。同时赞同陈望道先生提出的“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吸收外来新知，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严谨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的主张（见陈望道著《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序》）。

先生在语言研究室，协助陈望道先生为建立汉语文文法的功能学说，做了许多工作。陈望道先生写作《文法简论》一书和《论现代汉语中的单位和单位词》、《汉语提带复合谓语的探讨》等重要论文，得到先生不少帮助。在此期间，先生在担负《辞海》修订稿的审稿任务外，还为《辞海》语言文字分册中的“中国语文著作”、“中国语文学家”、“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五个部分的条目撰稿，亲自查对核实资料，前后历时三年。

1966 年，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在动乱的十年，先生同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处境一样，失去了应有的政治地位和从事教学和学术工作的自由。可是，先生对党的信念矢志不渝，对于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从未放弃自己的责任。1970 年，复旦大学集中一批

中老年教师，组成“二十四史”标点组，先生亦被安排在该组工作。每天按时上班、下班，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与全组教师一起共同完成了《旧唐书》、《旧五代史》的标点校勘任务。先生还与朱东润先生、刘季高先生合作完成《春秋左传集解》的标校工作。

粉碎“四人帮”以后，先生精神振奋，心情舒畅，毕生为之奋斗的学业也获得了充分发展的时机，并取得丰硕的成果。几年来，关于语言文字和文学研究的专题论文已发表十余篇。先生的《王国维学术思想评价》一文，是近年来有关王国维研究的又一篇力作。文章不仅综合多年所得的丰富资料，而且在新的高度上对王国维的学术思想予以历史主义的估价。先生关于王国维研究的著述，已为国内外学者重视，所论亦常被引用于他们的著作。近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华裔加拿大籍学者叶嘉莹博士著《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就多处引用到先生的论点。先生所撰《古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亦为多年研究音韵学的结晶。文章对古音研究诸家的得失，剖析精当，论据确凿，且有缜密而独到的见解。如推崇钱大昕对上古声母研究的贡献，但不同意他的双声押韵之说；重视王国维对中古韵书源流考证的精确，但不同意他的《五声说》和古韵二十二部已完成定论的主张；同意上古音有复声母 $k\acute{l}$ 、 $p\acute{l}$ 、 $t\acute{l}$ ，但不赞成 $xm-$ 、 $gd-$ 、 $sn-$ 等都是复声母。此外，如《〈辞通〉重印前言》、《〈语言文字研究专辑〉前言》也都是学术价值较高的论著。前者所述关于《辞通》的特点和内容，后者所述关于清代朴学家和现在我们研究语言文字的条件等内容，已经是对于一部专著或一个学派或一个时期的学术倾向的至要之论。这对于我国语言文字学术史的研究不仅很有启迪，而且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

自 1979 年始先生用了六年时间完成《辞通续编》的编著任务。这部七十万字的新著，是在《辞通》编外遗稿的基础上，加以扩充诠释、编纂而成，它同《辞通》一样，也是一部大篇幅的学术著作。对于整理古籍、研究古典文学和汉语的历史词汇很有用处。先生